

春秋邦交研究

徐杰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博士文库

春秋邦交研究

徐杰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秋邦交研究/徐杰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4

ISBN 7-5004-4458-3

I. 春… II. 徐… III. ①外交史—研究—中国—春秋时代②外交—礼仪—研究—中国—春秋时代

IV. ①D829②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63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李 乔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新空气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a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徐君杰令撰写的《春秋邦交研究》一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他嘱我为之写一篇序文，这是我无法推辞的。

春秋邦交问题，与近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外交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本书作者用“邦交”一词命名，本源于《周礼·秋官·大行人》的“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种“邦交”是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古代中国各诸侯国之间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至于争霸而开展的“外交”活动。本书借用“邦交”一词，有别于近现代国家关系意义上的“外交”，但就其“邦交”形式和“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家关系的外交有相通之处，故探究其内涵，某些借鉴意义则蕴涵其中。因此，前人研究者有直称其为“春秋外交”的（见雷海宗《春秋外交与战国外交》），当亦不应为误。

春秋邦交的出现是与王室衰微、诸侯力争而形成霸主政治的历史密不可分。当其时，“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霸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大国争霸过程中，战争和外交手段交替使用，而当时的外交手段则表现为各诸侯之间的朝、聘、会、盟等邦交形式的频繁进行。各邦国的政治家纷纷登上外交舞台，演出了许多动人心魄的外交故事。正因为春秋时期有丰富的外交活动内涵，徐君杰令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是值得称道的。现在本书问世，献给读者求

教，同时也能使学界同行从中受益。

据我理解，本书是围绕着春秋邦交活动的时代特点这一中心线索而陈述的。书中正确地指出：“春秋时期的邦交思想的演进是循着由重道德的作用，而趋向重现实的利益，由崇尚礼、信，而趋向诈伪和计谋的轨迹发展的。”（见本书第三章）这一论点无疑是令人信服的。

归纳本书的内容，春秋邦交的时代特点大致有三点：

1. 进入东周后，西周宗法分封制虽日趋崩溃，但其宗法网络仍未彻底瓦解，春秋时代的邦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到宗法制的约束。周天子的地位虽已跌落，但其牌位，霸主们尚不能将之完全丢弃。在当时的邦交活动中，霸主们往往要打着“尊王攘夷”、“求诸侯莫如勤王”的旗号。在其盟会活动中，诸侯之间仍要遵循“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的宗法原则。总之，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在春秋邦交活动中还起有一定的作用。

2. 在春秋邦交活动中，有的霸主倡导“轻其币而重其礼”（《国语·齐语》）的原则。他们往往以礼仪相要求，借以取信于中小诸侯，在政治上争取得到他们的服从。本书立“春秋邦交礼仪”专章，对朝觐、聘问、会盟、餼燕等礼仪细节逐一阐释，揭示出当时邦交活动重礼节的真实情况。对于这些礼节的考证，作者不仅利用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周礼》、《仪礼》、《礼记》等资料，而且结合金文资料来稽证，更赖以得到山西侯马盟书的出土而重现当年盟会的情景。

3. 春秋邦交尚能遵循重道德、讲诚信的原则，与战国时代重利轻义、讲计谋、施欺诈的风气大不相同。本书在第三章“春秋邦交思想与邦交艺术”中对春秋邦交关系中倡导诚信原则展开论述。书中认为：“对大国来说，守信与否，不仅关系到其能否称霸，也关系到其能否笼络与国。”“小国要想在当时强兼弱、大

凌小的形势下生存下去，必须以诚信敬事大国，否则就会有亡国之虞。”诚信往往成为当政者处理邦交事务的信条。当然，到春秋后期，霸主们丢弃诚信原则也是历史之必然，是司空见惯的。

本书以足够的篇幅来展现古代中国政治家的外交才能和外交智慧，专列“管仲的邦交思想”和“子产的邦交思想”节目，其内容富有启迪意义。前者作为齐相，为齐桓公出谋划策，实行内政改革，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另一方面他又向齐桓公提出了“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僖公七年）的思想，从而赢得众诸侯的信服，称霸于东方。而后者作为小国的执政，他能利用矛盾，周旋于晋楚之间，采取平衡外交，免受大国的欺凌而得以生存，同时为维护本国的利益，对大国的霸道行为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在春秋霸主政治的氛围下，通过有效的邦交策略，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争得了相对和平的生存环境。古人的外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或许仍有某些启迪作用。

据我所知，徐君杰令的这本专著，用力甚勤。他是经过几度春秋，寒窗苦读，抛家舍业，冷静思索而艰辛完成的。我希望他能以此为开端，今后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詹子庆

2003年8月10日于东北师范大学

前 言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各国史书的名称。当时各国都设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①《墨子·明鬼》曾提及的史书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称“吾见百国《春秋》”。后来，各国史书都先后亡佚，只有鲁之《春秋》因孔子整理而入于“六经”，成为儒家经典，才得以保存下来。鲁之《春秋》所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共十二位国君，历时 242 年。因此，人们就将这个历史时期称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作为历史时代，始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止于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战国七雄局面初步形成。^②

春秋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日渐衰微，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能力，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社会由有序陷入无序的混乱局面。失控诸侯中的一些有实力者，为了争夺对其他诸侯的控制权——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春秋时期的起点，史学界无疑义。终点，共有四说：一是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 481 年，因鲁之《春秋》止于这一年；二是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 475 年，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始于这一年，郭沫若先生力主此说；三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即公元前 453 年，“三家分晋”，金景芳先生力主此说；四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 403 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司马光《资治通鉴》即主此说。本文采用金景芳先生的公元前 453 年说，详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0 页。

即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远交近攻，恃强凌弱，甚至兼吞小国，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出悲惨壮烈的剧目。司马迁在概述春秋时期的历史时说：“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①与此同时，各诸侯之间朝、聘、会、盟等活动频繁进行，战争和使节往来相交织，成为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的一大特点。仅在《春秋》所记的242年间，就记战争483起，记朝聘会盟450次。^②因此，对春秋时期诸邦国之间的相互交往情况，即邦交问题，进行深入、科学、系统的探讨，对于我们认识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邦交”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大行人》的“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后为历代学者所沿用。这里，笔者之所以采用“邦交”一词，而不使用“外交”，一则是因“邦交”一词自古以来习用已久，而“外交”一词现代色彩过重，易与近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之“外交”在概念上混淆；再则是因春秋时期诸邦国之间相互往来的邦交有其与后世不同的形式，如朝、聘、会、盟、遇等，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

春秋邦交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它包括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官制、礼制、军事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有关春秋邦交的研究由来已久，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如《春秋》、《左传》、《国语》、《周礼》、《诗经》、《仪礼》、《礼记》、《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9页。

成书于后世的《公羊传》、《谷梁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淮南子》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宝贵材料。而汉儒郑玄、何休及历代学者所作的注疏，特别是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①和杨伯俊先生的《春秋左传注》^②，也为我们研究和认识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

较早对春秋邦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西晋著名学者杜预，他在所著的《春秋释例》一书的《会盟朝聘例》、《战败例》、《公行至例》、《吊赠葬例》、《灭取人例》、《内外君臣逆女例》、《侵伐袭例》、《崩薨卒例》、《及会例》、《归入纳例》、《归献例》、《王侯夫人出奔例》、《执大夫行人例》、《迁降例》、《以归例》、《夫人内女归宁例》、《大夫奔例》、《逃溃例》、《执诸侯例》中，对《春秋》、《左传》及前人注疏中有关春秋时代诸邦国之间的邦交活动、邦交原则和邦交礼仪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类、考证和整理，并提出了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宋代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元代吴澄的《春秋纂言》、明代石光霁的《春秋钩玄》、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都在宾礼、嘉礼和军礼中，对《春秋》、《左传》中所记载的邦交活动进行了分类汇编，同时对春秋邦交的形式、原则和礼仪也有所考证、阐述。

清代学者有关“三传”的考释，对邦交问题也多有涉猎。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在宾礼表、嘉礼表、争盟表、交兵表和兵谋表等表中，对文献史料进行了重新分类、整理和排列，在该书附录中以叙、考、论、辩为题的文章中，对邦交问题多抒己见，颇多创获。马驥著《春秋事纬》、高士奇著《左传纪事本末》以国分类，以年为经，以事为纬，重新编排史事，在文后的按语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对邦交问题亦多有创见，有些观点很有启发性。但严格说来，这些学者虽然在春秋邦交问题的研究方面费心不少，也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不过囿于时代的局限，无论是在思维方式、理论水平，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缺乏系统和科学，因此他们的研究只能是对史料进行分类、整理、排列和考证等的史料汇编，实际上是在一个低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地做着重复性的工作，只是在前人的认识上一点一点的积累，根本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现代学者对春秋邦交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失利，特别是 1919 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从多方面寻找解决外交问题的新途径。于是，一些学者力图从史学领域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在这种情况下，1924 年张心徵先生出版了《春秋国际公法》一书，以《左传》记载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涉往来中所遵守的种种礼仪和原则，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相比较进行研究。此后，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还有徐传保的《先秦国际公法之遗迹》^①、陈顾远的《中国国际法溯源》^②、洪钧培的《春秋国际公法》^③。关于春秋邦交问题的第一篇专论性质的学术论文，是雷海宗先生于 1942 年发表的《春秋外交与战国外交》^④一文。文章在对春秋外交的辞令、歌（赋）诗、盟会的程序和原则、大国和小国的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指出：“总览春秋外交的各种情形，欺诈的作用虽不能免，但大体还是有规则、讲道理、重礼节的国际交往周旋的一种方式”，强调春秋邦交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时代特点。

① 中国科学公司 1931 年版。

②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③ 中华书局 1939 年版。

④ 《大公报》1942 年 7 月 23 日。

80年代,刘正民先生发表《春秋外交简论》^①,对春秋邦交的基本概况、基本观点、历史作用及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春秋外交的矛盾集中在称霸与反称霸、兼并与反兼并这个焦点上”。提出春秋邦交的作用和影响是“促进了各民族的自然融合”;“促进了各国间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一些比较著名的政治家努力推行‘信义外交’,增强了列国间的友谊和了解”;“某些国家在外交活动中所采取的不畏强权的斗争策略,捍卫尊严的原则态度,以及一些外交志士所显露的气节和情操,对于我国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影响尤为突出。”

进入90年代,学者对春秋邦交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论文有五十余篇,可以说这一问题领域内的研究成了春秋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对春秋邦交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在春秋邦交问题的综述方面,孙家洲先生的《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②,从春秋霸政研究的角度入手,在霸主的权利、义务、所采取的策略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霸主与天子、霸主与诸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霸主与周天子的关系上,“霸主在某些方面已具备了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条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霸主还必须依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间接地发挥其作用”;在霸主与诸侯的关系上,“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依附。所以,一个国家要维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合诸侯以崇德也’,‘拘之以力,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就成了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

① 《荆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少的手段。”陈筱芳先生的《论春秋霸主与诸侯的关系》^①通过对霸主与诸侯之间权利与义务的考察，指出：“霸主与诸侯相互交往的大量事实表明，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因素，但不能代表他们之间的主导关系。其主导关系是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霸主有权要求诸侯朝觐、献职贡、听令，也有救患、分灾、字小的义务；诸侯有朝霸主、献贡和奉命参战的义务，也有要求得到霸主庇护的权利。这种权利和义务符合春秋礼制规范。”是很有见地的。吕世忠先生的《略论春秋列国外交的特点》^②，也对春秋外交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裴默农先生在《春秋战国外交群星》^③一书的《绪言》中，对春秋邦交所涉及的礼制、道德观念、邦交人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何茂春先生在《中国外交通史》^④第二章《春秋争霸中的外交斗争》，也对春秋邦交所涉及的外交谋略、外交制度、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论及外交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总论性的研究之外，专题性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学者们对春秋邦交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邦交，离不开使节等有关的邦交人员，而邦交人员的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邦交关系的走向。裴默农先生的《春秋外交人才遴选》^⑤，对邦交人员的来源、邦交人员在德、才、学等方面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进行了考察，很有深度，论证也很精辟。

春秋邦交的中心内容是围绕对其他诸侯的控制权进行争霸的

①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② 《东岳论丛》1993年第3期。

③ 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 《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问题。陈恩林先生《论春秋五霸的争霸战略》^①对春秋五霸以政治和外交为主的争霸战略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上）（下）》^②、《春秋战争之地域分析与列国的争霸方略（上）（下）》^③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春秋时期各主要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阐述了霸主产生的地理原因和其争霸的方略。黄琳斌《试论〈左传〉的崇霸思想》^④、刘保昌《春秋时期楚国战战略论》^⑤、周鼎初《关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历史作用异议》^⑥、刘保昌、游燕凌《春秋时期楚晋战略之比较》^⑦、谢军鹏《浅谈“春秋五霸”》^⑧也都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

春秋邦交有着自己特有的邦交礼仪——朝、聘、会、盟等，学者对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郑春生《朝聘礼制管窥》^⑨、刘玉堂《楚国的朝礼与聘礼》^⑩、陶磊《“聘礼”与先秦的外交礼仪》^⑪、石艳芳《试论春秋时期朝聘的特点》^⑫、李无未《春秋朝覲的衰变》^⑬从各自的角度对春秋邦交中的朝礼和聘礼的仪节和原则进行了探讨。

而更多的学者则把目光投向了会盟问题，发表了多篇论著，

-
- ①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 ②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4期。
 - ③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3期。
 - ④ 《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
 - ⑤ 《江汉论坛》1996年第9期。
 - ⑥ 《咸宁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
 - ⑦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 ⑧ 《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 ⑨ 《上海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 ⑩ 《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2期。
 - ⑪ 《寻根》1998年第5期。
 - ⑫ 《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1期。
 - ⑬ 《东疆学刊》2002年第2期。

计有：日本学者本田济的《春秋会盟考》^①、徐连城的《春秋初年盟的探讨》^②、台湾学者刘伯骥的《春秋会盟政治》^③、王庆成《春秋时期的一次“弭兵会”》^④、杨升南《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弭兵之会”考——兼论对“弭兵盟会”的评价》^⑤、韩隆福《论弭兵之会》^⑥、文士丹的《春秋列国之间的盟会》^⑦、王晓卫的《春秋间盟誓风气的转变》^⑧、宣兆琦《关于夹谷之会的几点辨析》^⑨、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⑩、《论春秋会盟的特点》^⑪、张二国《先秦时期的会盟问题》^⑫、莫金山的《春秋列国盟会之演变》^⑬、李模《先秦盟誓之制实质述评》^⑭、《试论先秦盟誓之制的演化》^⑮、《先秦盟誓的种类及仪程》^⑯、《试论先秦盟誓制度的历史功用》^⑰、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⑱、陈智勇《试析春秋时期齐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⑲。这些论著对

-
- ① 《日华学报》1950年3月。
 - ② 《文史哲》1957年第11期。
 - ③ 台湾中华文化丛书1962年版。
 - ④ 《江汉学报》1963年第11期。
 - ⑤ 《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
 - ⑥ 《贵州史学丛刊》1986年第1期。
 - ⑦ 《争鸣》1986年第3期。
 - ⑧ 《历史教学》1992年第11期。
 - ⑨ 《齐鲁学刊》1993年第4期。
 - ⑩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
 - ⑪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 ⑫ 《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
 - ⑬ 《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
 - ⑭ 《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⑮ 《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
 - ⑯ 《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4期。
 - ⑰ 《天府新论》2001年第1期。
 - ⑱ 《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 ⑲ 泰安教育学院《岱宗学刊》2001年第2期。

春秋会盟的形式、特点、程序、作用及其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本上弄清了有关春秋会盟礼仪的一系列问题。晁福林《春秋时期的“诅”及其社会影响》^①、刘向明《誓盟诅约与我国先秦法制》^②,则对盟誓中的诅词进行了研究。

在春秋邦交中,邦交人员讲究辞令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潮流。学者们对此给予极大的重视,武惠华《〈左传〉外交辞令探析》^③、刘竹《春秋发微言战国饶辩士——先秦公关外交语言艺术综论》^④、陈敦荃《〈左传〉外交辞令臆说——诸侯小国向大国抗争的重要武器》^⑤、谢其祥《巧辞妙语胜却甲兵百万——小议〈左传〉的行人辞令》^⑥、甘佩钦《试析〈左传〉外交辞令在战争描写中的作用》^⑦、高益荣《〈左传〉说辞的特色及其成因》^⑧、胡安顺《〈左传〉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论说方法之比较》^⑨、周曙光《谈〈左传〉中外交辞令的特色》^⑩、陈才训《〈左传〉行人辞令与〈战国策〉策士辩辞比较》^⑪、贺陶乐《先秦外交谏说的非语言艺术》^⑫等文章利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邦交活动中辞令的认识和看法。

赋诗,也是在春秋邦交活动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张宇恕《从

① 《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

② 《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③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④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⑤ 《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⑥ 《广西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⑦ 《兰州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⑧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⑨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⑩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

⑪ 《社科纵横》2001年第4期。

⑫ 《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①、《春秋宴会赋诗研究》^②、任晓勇《春秋“赋诗”及其它》^③、童汝劳《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习俗》^④、刘勇刚《试论〈左传〉“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⑤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之的形式、原则和特点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出现了“信任危机”，人们之间互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在邦交活动中，往往采用人质的方式来保证相互之间的信任，及对盟誓的忠实履行。孙瑞《试论春秋时期的人质》^⑥，对春秋时期存在于邦交中的人质的形式、人质的身份、人质的待遇及人质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人质在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认识。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和兼并战争的激烈，以及他们之间根本的矛盾冲突，这就限制了人质的作用，使它的作用只是暂时的，有限的。”贾继东《楚国人质外交小议》^⑦则从楚国的立场上对邦交方面的人质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外，杨爱民《春秋战国质子制度考论》^⑧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春秋时期还有一种特有的现象，即出奔。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对各诸侯的邦交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彦修《春秋“出奔”考述》^⑨对出奔的原因、结局和历史效应进行了探讨。

① 《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② 《管子学刊》1998年第1期。

③ 《淮北煤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④ 《文史杂志》2000年第3期。

⑤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⑥ 《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

⑦ 《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⑧ 《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⑨ 《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

陈筱芳《试论春秋奔者与本国和奔国的关系》^①从政治动机、政治利益和情感因素等方面讨论了奔者与本国和奔国的关系。徐杰令《论春秋时期的“出奔”》^②从出奔者的母国和接受国对出奔者的态度入手，着重探讨了出奔对诸侯邦交关系的影响。认为出奔不仅影响诸侯之间的邦交关系，在春秋贵族社会瓦解过程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政治联姻，是春秋诸侯处理邦交问题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它缓和或加深了诸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婚姻制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陈筱芳《春秋婚姻形态的特点》^③、宋公文、陈慧君《试论春秋时期的楚秦联姻》^④、陈宁《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对诸侯婚姻制度的影响》^⑤、王连儒、李廷安《〈左传〉所见诸侯婚姻中的宗姓认同与“兄弟之国”》^⑥、李廷安《〈左传〉所见诸侯婚姻中同姓婚姻的一般禁忌原则》^⑦、束有春《浅谈先秦时代诸侯嫁女》^⑧、裴默农《春秋战国联姻外交》^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战争是春秋邦交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是调整邦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和时代特点，在当时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和意义。陈筱芳《试论春秋列国间的战争》^⑩试图通过对春秋时期战争的考

①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② 《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③ 《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

④ 《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⑤ 《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⑥ 《管子学刊》1999年第2期。

⑦ 《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⑧ 《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⑨ 《世界知识》1989年第21期。

⑩ 《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